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2023年6月上旬刊
总第64期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编者语

欢迎阅读备受期待的最新一期《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请准备好进入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动态领域的沉浸式旅程，共同汇聚创新战略和尖端方法，以应对我们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威胁。

在一个充斥着错综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危机的世界里，必须超越植根于军事力量和国家中心模式的传统安全概念。我们的集体意识必须扩大，以涵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部范围。

联合国负责和平行动的副秘书长让 - 皮埃尔 - 拉克鲁瓦说，在过去几年里，大多数联合国和平行动都面临着安全和政治环境的恶化。除其他跨境挑战外，环境退化和极端天气事件 -- 因气候变化而加剧 -- 对特派团执行任务的能力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各

地的国内食品价格通胀仍然很高。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4 月期间有食品价格通胀数据的最近一个月的信息显示，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通胀率很高，在 70.6% 的低收入国家、81.4% 的中下收入国家和 84% 的中上收入国家，通胀率高于 5%，其中许多国家经历了两位数的通胀。此外，80.4% 的高收入国家正经历着高额的食品价格通货膨胀。

东盟粮食安全储备委员会

(AFSRB) 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一次会议，以解决与粮食有关的挑战，如粮食危机和粮食储备。会议的主要重点是收集和更新关于东盟国家当前需求的信息，并探讨应对这些挑战的政府间措施。

根据 Welt Hunger Hilfe

(WWHH) 新发布的报告，气候变化威胁着全世界数十亿人的生计，并加剧了饥饿，尤

其是在全球南部的农村地区。忽视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侵犯了今世和后代获得充足食物的人权。

关于苏丹局势，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对正在发生的军事冲突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对平民的所有攻击。有报道称，人道主义行动者以及民用物品、医务人员和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人道主义物资遭到抢劫。

我们对您的坚定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全心全意地邀请您通过本期杂志中提出的各种观点，开始一次远征。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解开一个更安全、更有保障的未来之谜。

我们欢迎读者的反馈，并期待听到您对本期刊物的看法。

2023 年 6 月 15 日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刊物编辑部

目录

01	智库追踪 THINK-TANK TRACKING	11
02	前沿研究 FRONTIER RESEARCH	16
	网络安全、种族和真相政治	16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指数：一项关于巴基斯坦的案例研究	17
03	学者访谈 SCHOLARS INTERVIEW	18
	Alexander Borum: 难以应对 -- 如何稳定欧盟的近邻地区	18
	朴尚哲：英国的战略转变：后脱欧时期应面对 CPTPP 成员资格的经济与其政治影响	21
04	研究员专栏 RESEARCH COLUMN	23
	黄建钢：“概念”的发酵及对策：非传统安全问题	23

学术委员会



余潇枫

主席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魏志江

委员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主编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冯长根

委员

科技安全专家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利兹大学物理化学系博士



余翔

委员

知识产权专家

欧洲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湖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管理学博士



徐晓林

委员

非传统安全治理专家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原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

组专家



黄建钢

委员

海洋安全专家

浙江省社科二级教授

浙海大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CZZC) 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陈斌

委员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长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主任

广东印太和平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顾问团队



Ritu Agarwal
经济安全专家
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德里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



Keven E. Bermudez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专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顾问、“好邻居”组织创始人
医学博士



高剑波
信息安全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博导
UCLA 电子信息工程博士



胡靖
粮食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Mohd. Aminul Karim
区域安全合作专家
孟加拉国独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会员
印度达卡大学博士



刘国柱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Yannis A. Phillis
产业安全专家
克里特科技大学校长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动态系统控制博士



谌新民
人口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决策顾问专家
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



成锡忠
海外利益保护专家
西南政法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所特聘教授
北京中安华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常务顾问
西南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Chris Hadley
社会安全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何一平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原执行会长
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原副主任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李晓峰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
博士与博士后导师
复旦大学博士后



林坚
文化安全专家
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Filippus Proedrou
能源安全专家
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员
色雷斯民主大学能源学博士



Jeffrey Reeves
文化安全专家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副总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Syed Hussain Shaheed Soherwordi
恐怖主义问题专家
白沙瓦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教授
爱丁堡大学博士



Kate Tulenko
公共卫生安全专家
Corvus 医学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Johannes Urpelainen
能源安全专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AIS 教授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



Vlado Vivoda
能源安全专家
昆士兰大学可持续矿产研究院研究员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余乃忠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特约编辑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于铁军
国际安全理论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主任，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



姚羽
网络安全专家
东北大学教授，博导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会评专家
国家 863 高科技计划会评专家
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



张金生
贸易安全专家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赵英
产业安全专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周树伟
社会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高端智库专家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广东省商务厅原副巡视员



朱新光
社会安全专家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研究员团队



艾尚乐

金融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程永林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外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后



樊守政

恐怖主义问题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南京大学法学博士



侯颖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博士后
澳门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晋继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副院长、博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Ilan Kelman

风险与减灾研究员
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伦敦大学风险与减灾研究所教授



李佳

文化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副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



陈永品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博士



陈玉梅

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
电子高级工程师
暨南大学政务大数据开放与社会创新创业
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澳门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侯建雄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
广东世能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



黄永弟

“一带一路”非传统安全风险研究员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广东金融学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治理研
究所所长



Irfan Ullah Khan

人口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候选人



李方芳

全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健康外交顾问
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巴塞罗那国际健康研
究所双博士



李乾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廖丹子
非传统安全理论高级研究员
浙江省数字安防与非传统安全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刘凤元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华东政法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



刘金山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暨南大学投资咨询（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刘天阳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哲学博士



刘元玲
气候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卢矜灵
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越南语信息员



麦方
财政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Bakirov Maksatbek
中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吉尔吉斯奥什国立大学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莫有恒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候选人



覃胜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山大学医学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Imran Ali Sandano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巴基斯坦信德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Luis L. Schenoni
拉美安全研究特邀研究员
伦敦大学学院安全研究助理教授
圣母大学政治学博士



汤取安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中城卫保安集团原国际部副总经理
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安全专家（CISSP）
中国国家注册高级保卫师



Diana Toimbek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哈萨克斯坦国际研究实验室高级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王彥兴

社会安全研究员
广东省惠州市府办政策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王新和

北极问题高级研究员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王卓

社会安全高级研究员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博士



谢法浩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谢贵平

边疆安全治理高级研究员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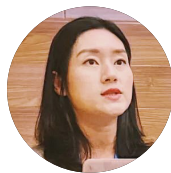
许涛

中亚地区安全高级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亚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导
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



张建华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章雅荻

移民治理方向研究员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赵欣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广东法学律师研究会副会长



郑先武

区域合作安全高级研究员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周龙

人口安全研究员
广外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副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周木亮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商务局国际招商处处长



钟晓君

经济安全研究员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财经学院商务系主任，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周燕萍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周章贵

资源安全高级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水资源安全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邹冠炀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英国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博士

1 智库追踪

应对气候冲击：生态系统与经济体系

生态安全：气候安全

Cem Karayalcin,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经济学教授; Harun Onder, 宏观经济学、贸易和投资全球实践高级经济学家。

研究发现，自然环境中的抗干扰能力和恢复能力之间存在权衡，不同生态系统和生物体的性状在这种权衡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同样的，经济系统中也存在类似的权衡，尤其是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经济更容易面临脆弱性和弹性问题。其中，自然资源的产权机制可以对这种权衡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在动荡的气候变化下，

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权衡需要重新校准，人类需要适应自然不断变化的挑战。

来源：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23/05/15/coping-with-climate-shocks-ecosystems-versus-economic-systems/>
2023年5月15日

中央银行：不确定性是问题所在，而不是如何应对三难困境

经济安全：金融安全

Francesco Papadia, 希腊金融稳定基金 (HFSF) 遴选委员会主席。

IMF 总结出了欧洲现在面临的三难困境，即如何维持经济复苏、战胜通货膨胀和维护金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政策尤其重要。中央银行必须在三个困境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欧洲央行可以致力于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并合理地期望它能够在不造成金融不稳定或对经济活动和就业造成太大损害的情况下这样做。此外，央行的作用需要得到重视。对于通货膨胀，央行的行动是决定性的，但人口结构、气候危机等长期问题需要长期内

才能解决，并不是央行的主要责任。在当前环境下，央行还需要关注美联储加息对金融稳定的风险。总之，央行的任务是艰巨的。基本经济关系越来越模糊，经济不确定性使决策更加困难。

来源：

<https://www.bruegel.org/first-glance/central-banks-uncertainty-problem-not-managing-trilemma>
2023年5月19日

穆尼议员批评美联储的 CBDC 试点计划

经济安全：数字货币

Nicholas Anthony, 卡托研究所货币和金融替代中心的政策分析师。

美国的央行数字货币 (CBDC) 试点项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了控制 CBDC 的高风险和潜在错误的发展，众议员 Alex X. Mooney 提出了一项法案，控制美联储的自由裁量权。该法案要求美联储需要得到国会的授权才能自行或通过私营部门承包商开展 CBDC 试点。这将有助于防止试点悄悄地推向大众。虽然美联储最近调整了一些有关 CBDC 的公开声明，但它们在某些方面仍然给出了让人感到担忧的理由，

比如，CBDC 可能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实现必要的安全特性和设计特性。因此，针对 CBDC 行动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需要注意实验室研究和试点之间存在微妙的区别。

来源：

<https://www.cato.org/blog/representative-mooney-calls-out-feds-cbdc-pilots> 2023 年 5 月 26 日

改革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为期 25 年的“紧急”对外援助计划

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

Tim Meisburger, 美国传统基金会 Douglas and Sarah Allison 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PEPFAR) 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对外援助项目之一，旨在提供紧急援助，为非洲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然而，这个计划仍存在着结构和方法上的重大问题。例如，该计划由国务院而非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管理，使用的方法并不能赋予非洲人民权力或结束他们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并可能因为在 PEPFAR 上投入过多资源而导致其他卫生投资的资源较少，从而降低社区的整体健康状况。此外，

PEPFAR 受到政治化的影响，存在系统性和制度化的政治歧视，拜登政府和合作伙伴试图将其国内社会议程 (如堕胎和宣传性别意识形态) 纳入计划中。在向该计划提供资金之前，国会应要求进行改革，以重点关注真正需要援助的人，并抵制政治化的干扰。

来源：

<https://www.heritage.org/global-politics/commentary/reform-pepfar-the-25-year-emergency-foreign-aid-program> 2023 年 6 月 8 日

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受到的驱逐：一个批判的视角

■ 社会安全：难民问题

Nicholas Anthony, 伦敦国王学院发展人类学博士，劳动力转移研究专家。

近期黎巴嫩的反难民情绪再次升温，导致叙利亚难民被临时驱逐回家。黎巴嫩的经济危机、当地货币贬值、体制崩溃和总统僵局等因素加剧了对难民的排斥，使得在黎叙利亚难民一直是其社会经济系统功能失调的替罪羊。黎巴嫩政府声称仅驱逐“非法”难民，但矛盾的是，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承认难民地位，对难民登记工作加以阻挠。此外，政府在冲突初期采取了“无政策政策”，并承诺保持与叙利亚的边界开放，因此没有及时遏制难民入境。这次驱逐难

民的举动可能会加剧黎反难民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疏远黎叙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也影响黎巴嫩的经济稳定，因为企业严重依赖着叙利亚的商品劳动力。难民驱逐的背后，是地缘政治气候、反对派和盟友的多种因素交织，后续发展令人担忧。

来源：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89817s> 2023 年 5 月 23 日

加拿大联邦政府应对数据泄露的成绩单

■ 信息安全：数据安全

Matt Malone, 汤普生河大学法学院的助理教授。

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在寻求对企业实施更好的隐私和数据保护实践。但是，政府自己的机构和部门中的数据泄露事件通常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通知加拿大财政委员会秘书处和隐私专员办公室。去年，81% 的针对联邦政府机构侵犯隐私权或未能对个人信息采取适当保护措施的投资诉存在问题。此外，信息专员办公室对这些调查的平均处理时间长达数百天。这加剧了滥用敏感信息的脆弱性，并侵蚀了对其的信任。

联邦政府还经常对网络攻击不屑一顾，调查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处理。因此，联邦政府需要更强有力的立法、授权和独立的执法者，以及更有力的激励政府雇员从事这项工作。

来源：

<https://www.cigionline.org/articles/a-report-card-on-the-canadian-federal-governments-response-to-data-breaches/> 2023 年 6 月 7 日

美国对外援助用于推动世界各地的堕胎和性别意识形态

文化安全：意识形态问题

Tim Meisburger, 美国传统基金会 Douglas and Sarah Allison 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美国每年在对外援助上花费超过 400 亿美元，但随着联邦机构和非政府援助组织在开展援助项目时日益推行左派意识形态和议程，其议程不仅威胁到国会的支持，还可能疏远那些需要援助的国家。这些极左的议程是由名为“国际行动”的组织协调的结果，该组织通过制定 DEI 契约和气候契约等方式，推广新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意识形态。此外，该组织还提倡堕胎的普遍“权利”，增加对女权

组织的资助。这种对外援助的党派和分裂议程可能会破裂两党的承诺，引起纳税公众的反感。国会应该取消任何推动党派事业或政治和意识形态灌输的项目，确保不再有纳税人的资金用于支持明显带有党派色彩的国际行动组织。

来源：

<https://www.heritage.org/global-politics/commentary/us-foreign-aid-used-push-abortion-gender-ideology-around-the-world> 2023 年 6 月 8 日

欢迎来到平台军事时代

科技安全：数字技术

Daniel Araya, CIGI 高级研究员，世界法律峰会的高级合伙人。

网络平台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从增强战场态势感知到为自主武器系统提供动力，数字技术正在将战争带入网络时代。数字平台使得现代军队专注于云计算，以将复杂的军事企业转变为围绕数据驱动平台构建的企业级网络。而 AI 技术更是被广泛应用于驾驶无人机、收集情报和瞄准敌人阵地。然而，与技术的进步不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数字技术。随着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日益复杂的创新环

境中，对抗性竞争也随之增加，日益加剧的多极秩序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快政府投资先进技术的步伐，尤其是人工智能。当代技术变革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正在重塑全球秩序。因此，军队需要加快行动并做出更好的决策。

来源：

<https://www.cigionline.org/articles/welcome-to-the-era-of-the-platform-military/> 2023 年 6 月 5 日

拜登教育部有缺陷的宗教自由“指导”藐视法庭先例

文化安全：宗教问题

Sarah Parshall Perry, 米斯中心高级法律研究员者; Amelia Gradick, 传统基金会 2023 夏季青年领袖项目成员。

拜登政府最近发布了一份指导方针《公立中小学受宪法保护的祈祷和宗教表达指南》。虽然它们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规则，但任何受监管的实体都不会忽视这份指南，因为它知道机构将强制执行其对法律的新理解。根据这份指南，公立学校可以采取“合理的措施”以确保学生不被强迫参加老师或教练的私人祈祷，并可以限制学生传播宗教文献。此外，这份新指导删除了过去特朗普政府发布的两项重要条款，一是保护学生午餐时间祈祷的权利，

二是允许学生团体选择认同团体使命的团体领导人。该指南还引发了一些反对声音，认为它可能误解最高法院判决，操纵法院判例，以实现政府期望的目标，并可能导致未来的诉讼。

来源：

<https://www.heritage.org/religious-liberty/commentary/biden-education-departments-flawed-religious-liberty-guidance-flouts> 2023 年 6 月 7 日

当环境危机成为政治现象时：荷兰的氮排放

生态安全：氮排放问题

Ignacio Urbasos Arbeloa, 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能源和气候领域的研究助理。

荷兰是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但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化肥（农业和进口牲畜饲料）中的氮，已经使自然氮循环失衡，许多地区将其存在提高到有毒水平。政府启动了国家计划，以期到 2030 年将氮沉积量减半，重点减少与 Natura 2000 保护区相邻的地区。然而，一个新的农民粹主义政党，农民公民运动（BoerBurgerBeweging, BBB）威胁到了国家氮计划的实施其领导人一再以严厉的欧洲怀疑论言论拒绝欧盟氮法规的合法性。荷兰的氮危机也为气候政策的未来提供了一些关键的经验

教训。引入气候诉讼促使政府和公司守承诺，其次，荷兰补偿政策揭示环境问题解决的技术局限，需要平衡减排责任和农民利益。氮危机还揭示了城乡环境问题分歧并非深刻，需要平衡农村利益与城市选民偏好和敏感性。

来源：

<https://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blog/cuando-una-crisis-medioambiental-se-convierte-en-fenomeno-politico-las-emisiones-de-nitrogeno-en-los-paises-bajos/> 2023 年 6 月 1 日

2 前沿研究

网络安全、种族和真相政治

Jeffrey Whyte

本文探讨了支持网络安全的种族政治最近转向在线传播虚假信息 and 在美国政治中施加“外国影响”的问题。通过对 BLM 运动案例的研究，文章认为当代网络安全已经扩大其传统的空间性，网络安全的种族化已成为真相政治的一种支持方式。

网络安全传统上被理解为对数字网络和基础设施的保护，但自 2016 年后网络安全话语越来越强调人性化的维度，特别是围绕虚假信息、操纵和政治影响等问题。当代网络安全是由不平衡的种族政治制成的，特别是黑人政治项目，即 BLM 运动，被呈现为战略漏洞，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受到外国操纵。文章认为当代网络安全却是在试图压制各种形式的种族抗议、容忍种族不平等，而不是改善种族不平等。

其次，网络安全的人性化转变扩大了其空间范围。网络安全的空间围绕种族、统一、国内秩序和地缘政治竞争进行了重构，这已经超出“计算机”的定义范围。政治异议在网络空间中被转移到地缘政治竞争的层面，反映了“当今国内和国外空间之间的差异正在被迅速侵蚀”，网络安全已经扩展到政治抗议的层面与

空间。

本文强调，通过网络安全的逻辑，“种族紧张局势”的政治轮廓已经扁平化，对“种族团结”规范的呼吁等同于政治光谱中“分裂”的根源。网络安全的转变颠覆了种族不平等的结构，其所衍生而出的真理政治实际上不关心事件的真实性，而更多地关注定义民主社会中安全政治和沟通的界限。

本文认为，确保真相是防止以上问题恶化的基本措施，要加强对网络信息的审查与鉴别工作。此外，美国政治机构将“后真相”的问题归咎于恶意的外国行为者和国内种族化社区，逃避了自己在侵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解决民主危机需要通过选民选举和选区改革等直接手段，网络安全也需要在民主的地方维护权威。

来源：

Cybersecurity, 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truth Security Dialogue(2022), Vol. 53(4) 342–362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70106221101725>

编译：许汶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指数：一项关于巴基斯坦的案例研究

Munir Ahmad Khan Gasura, Dr. Ali Abbas, Alyas Ali Chaichi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作者使用 2016-2020 年的数据，研究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巴基斯坦人民发展指数 (HDI) 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和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大大降低巴基斯坦的人民发展指数。相比较其他面临非传统威胁的南亚国家，如印度和孟加拉，巴基斯坦的人民发展指数较低、排名偏后。因此，巴基斯坦政策制定者必须加大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视，以促进本国人民发展。

首先，作者列举巴基斯坦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第一，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和金融服务逐渐数字化，数据泄露导致的金融诈骗和网络犯罪越来越成为巴基斯坦急需解决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第二，恐怖主义是另一个主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巴基斯坦已面临数字恐怖袭击，导致生命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和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第三，气候问题也是另一个日益增长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巴基斯坦易受洪水、干旱和热浪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进而破坏该国的农业生产。第四，经济不稳定也对巴基斯坦的人类发展指数构成威胁。该国面临如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外债问题，导致社会贫困和发展不平等，

威胁到巴基斯坦人民受教育的机会。

其次，本文作者通过回归分析证实了上述分析。同时，根据显著性分析，恐怖主义是对巴基斯坦人类发展指数产生最显著的负面影响。其次是经济不稳定、气候问题和网络犯罪。巴基斯坦的人类发展指数在 189 个国家中排名第 131，和其他南亚国家相比，低于印度和孟加拉，但高于尼泊尔。

最后，作者提出几点建议。巴基斯坦政府可以采取多层解决措施，包括改善安全措施、加强灾难管理系统、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大国际合作和援助等方面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针对网络犯罪问题，政府需要制定有效战略，投资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和建立处理网络犯罪的法律框架。针对气候问题，巴基斯坦需要采取可持续和生态友好的社会发展方式。针对经济不稳定问题，政府需要专注以提高公民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

来源：

Impact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o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 Case Study of Pakistan
Annals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 2023 Vol. 4, No.2

编译：尹金灿

Alexander Borum: 难以应对 -- 如何稳定欧盟的近邻地区

气候变暖造成的安全威胁一直是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而 Mr. Borum 对于欧盟近邻地区近年来的族群冲突以及其与气候问题的关联有着深刻且专业的理解。于是，SPCIS 就如何看待欧盟近邻地区的地区冲突以及如何进行维和行动进行了独家采访，希望了解他如何将气候安全的视角整合到地区冲突的分析中，并如何将非传统安全融入到更广泛的安全范式。

本质上，冲突是由身份、资源和环境问题构成的驱动因素和根源的混合体。在这些情况下，气候变化为处理冲突安全问题增添了一个激进的新维度，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在脆弱环境中，由于系统性治理问题和低水平的发展，已经严重限制了应对这些影响的能力，尤其是在冲突已经肆虐的地方，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些脆弱的环境中，吸收重大环境冲击的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气候变化的系统性影响变得明显，造成不规则的降雨模式、长期干旱、严重洪水和极端天气事件，这些影响会立刻对当前局势造成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国际干预来解决问题并避免更加灾难性的场景。我们急需将这些考虑因素融入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安全范式中。在那些地区，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压力将加剧现有的冲突，并为新的冲突带来威胁，尤其是在从人类安全角度处理冲突时。这种冲突的加剧源于气候变化给当地社区、国家和地区带来的额外压力。气候变化极度破坏了社会稳定，并对社会中最贫困的人们带去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索马里是一个气候变化影响显著且丰富的环境。这在农

村地区尤其明显，那里的基础设施匮乏，生活方式通常以维持生计为主，以畜牧或农业群体为社会的主要构成。这些社区严重依赖环境来维持生活。他们是环境压力如何对本地社区产生负面影响，产生硬安全和软安全影响，并如何影响更广泛安全状况的关键例证。这些影响的体现之一是资源稀缺

特邀学者



Alexander Borum 在海牙莱顿大学学院取得了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的硕士学位，他现在是欧洲外交服务部的政治和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发展合作顾问。他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气候安全、非国家行为者、混合威胁以及外交、安全部门改革、稳定努力和人类安全之间的相互关联非常感兴趣。

由于全球变暖引发的安全威胁一直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而 Borum 对欧盟近邻地区近年来的族群冲突及其与气候问题的关联有深入且专业的理解。因此，SPCIS 对他进行了独家采访，以了解他如何看待欧盟近邻地区的区域冲突，以及如何进行维和行动。我们希望了解他如何将气候安全的观点整合到区域冲突的分析中，以及如何将非传统安全整合进更广泛的安全范畴。

性的上升，主要涉及动物、农作物和人们可用的水资源。随着严重和持续的干旱，自然资源的压力大大增加，并可能触发对剩余资源的竞争加剧。随着竞争的加剧，社会紧张也随之升级。由于身份政治的影响，部分地区的社会凝聚力有所减弱，这使得导致族群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使得社会分裂的因素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政治的、种族的、宗教的或国家的分裂。同时，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可以被看做导致冲突的决定性要素，正如在达尔富尔战争中所见。在索马里的情况下，部族在历史上一直是导致冲突的因素，也是过去围绕资源的冲突分歧线。由于严重的干旱在索马里几乎是常态，所以很明显，在水稀缺最严重的地区，当资源稀缺性上升时，部族之间的冲突风险也将增加。

从族群冲突向战略层级迈进，当观察到对本地社区的环境压力增加时，其他不利影响也变得明显起来。当这些社区的本地生计受到日益恶劣的气候影响时，对那些挣扎以维持

生计的边缘群体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变得显而易见。在这种脆弱的情境中，非国家武装组织 - 如叛乱者或反叛团体 - 利用这种情况招募和激进化受影响社区的人们，他们的风险增加。他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最后手段，比如带领人们迁移到更绿色的草原。

此外，如果有足够的资源，武装团体可以将自己定位为公共服务和设施的提供者，为受影响的社区提供帮助或救援。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创造出一种叙事，即他们将自己确立为有效的事实上的反政府组织。当然仅提供救援可能还不足以赋予他们这样的地位。然而，如果这些团体已经建立具有管理能力的机构、法庭为人民提供安全和机会，那么在冲突的情境中，他们反政府的基础就会增强。这使得武装团体所具备的地位在它们和政府之间争夺当地人民的心和意识的斗争中，可能具有极大的优势，并可能会进一步延长和加剧冲突。

应对这些挑战经常需要第三方的干预，因为脆弱的冲突

环境常常受到治理薄弱、资源缺乏和能力差距等系统性问题的困扰。为了使这些干预措施成功，有必要在最理想的考虑和更务实的考虑之间找到平衡，使得项目的努力能够精简地实现其核心目标。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选择紧急救援、发展援助和和平建设相互交织的三重联结方法，或者在项目规划的规划和设计阶段整合气候安全的视角，是有意义的。这些方法有助于确保构建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气候变化的影响、人道危机、当地的能力和更广泛的安全环境都被认为是冲突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虽然很多气候安全考虑因素包含硬性和软性的形式，但软性安全 (soft security) 的实施在项目规划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软性和人类安全是非常相关的考虑因素，并且必须在编程工作中得到解决。但是，安全生态系统仍然复杂，而且在适用时，不能忽视硬性安全 (hard security) 的含义。在反叛乱的环境中，设计那些专门增强本地安全力量的操作

能力以认识和处理气候安全影响的项目和计划，对争议地区的人口非常有利。它们通过提供工具，让安全力量在他们的操作过程中能更全面地参与，从而提高了地面安全力量的有效性。

将气候安全的视角整合到安全力量的运营规划和情报中可以作为力量的助推器。这源于理解环境冲击和压力如何影响这些力量及其操作场所。例如，季节性洪水可能直接影响依赖装甲车辆的常规力量的行动自由，同时使得更敏捷的叛乱力量的安全移动成为可能。同样，干旱可能会显著影响敌人的部队生成和征募，使用像塔利班这样的策略，当传统的生计方式受到争议时，他们通过以微薄的金额租用本地平民来壮大他们的队伍。此外，这些因素对人类安全的影响对地区管理有着巨大的影响，并增加了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具有挑战性的非动力学维度。

对于未来而言，当我们讨论如何将非传统安全所考虑的因素，如气候安全，融入我们

更广泛的安全范式时，这个主题领域的安全问题显然值得更多的关注。然而忽视背景和过于强调部分因素最终将导致我们对实践者和学者如何务实有效地应对现实世界的安全挑战的理解变得片面。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复合风险。

翻译：巢未



朴尚哲： 英国的战略转变：后脱欧时期应 面对 CPTPP 成员资格的经济与其 政治影响

2021年1月1日，英国正式退出了欧洲联盟（EU）。自那时起，英国和欧盟签署了英欧贸易合作协议（TCA），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成本都将提高。实际上，由于经济结构和规模的差异，这对英国的影响比对欧洲联盟更为严重。由于英国的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因此英国自那时以来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高通胀，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欧盟，其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均衡工业结构保持了其经济的良好状况。为了克服英国在经济、防务、政治等方面的不稳定，鲍里斯·约翰逊政府在2021年推出了“全球英国”战略，专注于其直到2030年的长期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其他贸易伙伴，以尽可能减小其退出欧盟

带来的外部冲击。自二战以来，英国与“五眼联盟”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已经深化。因此，英国渴望进入被认为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强国的亚太地区市场，并在退出欧盟后的2021年2月1日申请加入跨太平洋全面与进步协定（CPTPP）。在CPTPP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已经是成员国。此外，包括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在内的四个东盟成员国已参加了这个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这为英国获得这些成员国作为盟友和伙伴的支持，加入CPTPP提供了完美的框架。

英国的下一步将首先是加强与成员国的贸易伙伴关系，以最大化其经济利益。同时，英国将通过加强其在2022年建立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朴尚哲教授于2002年11月在德国通过了政治学的资格考试（正式教授资格），并于2004年9月在瑞典通过了经济学的讲师评估（瑞典资格）。他目前是韩国理工大学知识技术与能源研究生院的全职教授，以及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科学创业中心的兼职教授。他还是德国吉森 Justus Liebig 大学的私人讲师和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研究兴趣涉及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以及创新系统研究，尤其是科技园区和创新集群。目前，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能源政策、可持续发展战略、高科技企业和国际商业与贸易。

英国在2023年3月31日的线上会议中与印太同盟达成了协议，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因此，SPCIS采访了朴尚哲教授，询问他对英国加入CPTPP的看法，以及此后英国的国际贸易发展方向。

Dialogue) 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工具, 聚焦其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因此, 英国可以参与亚太和印度洋 - 太平洋地区, 其参与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 而且其军事和政治利益也将超过欧盟。

英国政府在成本与收益分析后决定参与 CPTPP。然而, 英国的成员资格确实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首先, 它将面临来自其他成员国的高度竞争, 特别是来自澳大利亚、智利、墨西哥、马来西亚、新西兰和越南的农业部门以及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制造业部门。CPTPP 的规则, 包括关于知识产权、劳动标准、环境保护和

国有企业 (SOE) 的条款, 对英国来说不会是主要的障碍, 因为其已满足了大部分要求。然而, 处理远距离贸易的物流可以增加成本, 相较于在欧盟区域内的内部贸易, 减少了公司的利润空间。另外, 通过远距离贸易来减少碳排放, 以达到 2050 年碳中和的目标, 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 英国加入 CPTPP 并不直接影响中国申请加入 CPTPP。然而, 英国确实有足够的间接影响力, 因为所有 12 个成员国都必须一致同意接纳新成员。因此, 英国有可能利用其成员资格, 作为对中国申请的一种监控和控制机制, 与日本一道, 以进一步开

放中国对其的市场。

英国加入 CPTPP 将增加中国申请的困难, 因为中国加入 CPTPP 将实质上等同于中英自由贸易协定, 这将对英国的制造业带来全面的高度竞争。因此, 英国将尽可能避免中国加入的可能性。此外, 英国和 CPTPP 中的其他发达经济体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格地监控中国的入会过程, 以查看中国是否能够遵守 CPTPP 的规则, 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劳动标准、环保和国有企业的规定。由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和工业结构无法满足所有的监管要求, 这些监管目标是 CPTPP 能够满足的最高防火墙。

翻译: 巢未



4 研究员专栏

黄建钢： “概念”的发酵及对策：非传统 安全问题

自从2022年1月参加“第四届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论坛”以来，在我的思维当中，就有缘有故地多了一个“非传统安全”的思维及其视角。经过一年多的细心观察、搜索、学习后发现，身边确实多了而且还在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它们正在或者几乎已经成为“安全问题”的主要和主力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障碍问题。但深入和细致地琢磨后又发觉，“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研究更加重要。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思维进行哲学思考和科学对策迫在眉睫。“非传统安全”与“非线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应该和值得深究。

但这个问题目前被关注和被研究得还不是很多、很高、很明显和很重要。但现在看，这个问题发酵得很厉害，而且已经渗透和威胁到了一个思维和思想安全的层面。这种发酵的特性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是少见的，甚至是罕见的。所以，这是人类、国家和社会的根本问题，但又是“传统安全”至今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非传统安全”

是审视现实社会问题的一个崭新思维角度

“非传统安全”是一个新的话题和话语体系。以前都是“传统安全”。比如说，我们一般都讲的是“军事”安全问题，国防安全问题。但这个话题和视角还在不断发展和发酵之中。其实，现实中，“网络安全问题”就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典型形式，也叫“新安全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碰到的在网络上搜索不到想要数据信息的

问题，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信息安全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要做到和做好信息公开，但另一方面为什么大家需要的信息在网络上就很难搜到而获得呢？这其实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和布局的一个结果。连高智商的人和专门搞信息管理的人搜索直接数据信息都有困难和有困难，那么国外的一般人想要搜索有关国内事务的直接、全面、深入和系统的数据就可想而知地要更加困难了。在“信息社会”中，最强

研究员介绍



黄建钢，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学术委员，海洋安全专家，浙江省社科二级教授，浙海大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CZZC）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有在“非线性思维”下才能被发现。“非线性思维”又是“现代化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非线性思维”就没有“现代化思维”。但社会的一般思维还都是“线性思维”。这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还在人们一般思维之外疯狂繁殖的根本原因。从“非线性”的角度看“概念”，发现了其中“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互动、互通、交融进而形成一个现实整体的逻辑关系。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先倒的牌。但“非传统安全”反过来又是审视现实社会问题的一个崭新思维角度。现实是，“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非传统安全问题”新的主要问题。“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最容易引发和发酵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如“颜色革命”。其原因就在于，“概念”的不准确及其不体系和不系统。瓦解“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在于，要做好中文第四次造字。

的武器不仅是信息的科学和技术，而且还有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信息情报。所以，信息安全在“信息社会”中甚至就是至高无上的。信息安全更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及其深远性。这是传统安全思维难以想象的，更是无法解决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问题。但我们未必知觉。在这方面，所有的思维定式都将束缚我们对事务的判断。

现实是，除了网络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外，还有同样重要的是，海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应该把它纳入到“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范围之内。但现实是，在对海洋的研究中，好像还没有“非传统安全”的视角。我们很少考虑，海洋生态对国家安全形成的挑战甚至威胁。同样在“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中，也还没有海洋方面的内容。这是我们在“海洋世纪”中最大的学术漏洞。所以，需要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来看海洋的信息化及其程度的问题。看后发现，我国海洋还是存在很大的“非传统安全”隐患的。海岸线、

海岛、海洋一旦信息化了，就等于都公开化了，就会在类似Chat GPT的AI面前暴露无遗。我们现在的“海”几乎都存在与他国的争议问题。尤其是对海洋上的一些“概念”及其权益权利基本还都是模糊不清的和表层不深的。特别是对“岛”的战略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几乎还都没有“概念”和感觉。但在“海洋世纪”中，想称霸全球的势力对各国的海洋权益权利总是虎视眈眈的。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的台湾岛。目前基本还在一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范畴内进行思考和对策，而还没有多少“国家安全”的意识和布局。在“国家安全”意识上，我们一般都是让位于经济利益及其发展的。在这方面远不如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我国情况。按照现在这样的状况去看，台湾岛实际上已经存在和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我们自己国家在海洋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与台湾岛与大陆“契合”和“融合”得好坏既有关系，但关系又不是很大。从“传统安全”的角度看我国海洋安全，台湾岛的作用和意义主要在于和福建的关

系。但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看我国在“海洋世纪”中的安全问题，台湾岛的作用和意义就不仅在于中国国内岛链与美国针对中国的国际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关系，而且还在于台湾岛与舟山群岛，与杭州湾口、长江口、黄海口、渤海湾口的关系。由此来看，当初台湾岛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比朝鲜半岛问题还要更加重要和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更是非常之大，尤其是在当前。美国不仅把遏制中国的“岛链战略”的关键放在了台湾岛，而且还把维护二战以后国际格局的基本发展态势的重点也放在了台湾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实际上，因为台湾岛跟大陆还没有融合得很好的现状，我们国家原则上还不是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只能算间接的太平洋国家。因为台湾岛的东边海岸线直接面对太平洋。这个战略位置太重要了。但这个重要性从“传统安全”的角度是认识不了的。包括现在的我们其他人至多也就具有“海”的视野和视角，而还没有“洋”的意识和思维。从“概念”的角度看，我

们对“海”和“洋”还是区分不大的，甚至就是模糊的。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除了台湾岛的东边海岸线外，大陆与大洋之间都是隔着一个“海”的——南部有南海，东南角有东海，然后是黄海。渤海是另外一个概念，属于内海。所以，人们一般都是通过“海”来认识“洋”的，所以也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把“海”当作了“洋”。其实，海是海，洋是洋。这就是一个海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我们甚至还可以从中充分体会到“战略”这个“概念”的实际效果和效应——一个80年前的布局到了80年后还在发挥着作用，而且还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对“战略概念”最好的诠释。但是，我们整体上对战略的“概念”还是缺少一种本质的理解和运用，甚至还把它与“方略”“经略”“策略”混为一谈，特别是还把“战略”“方略”“经略”“都当成了“策略”。从上述的“信息”和“海洋”的安全问题中可以得知，混淆“概念”其实是“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最初的最本质的和最表象的表现。

比如，什么是“海洋”？英文怎么翻译“海洋”？是 sea，还是 ocean？还是 sea and ocean？还是 maritime？《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翻得对不对？还只是一个“海法公约”？是否还缺少一个“洋法公约”？什么是“公海”？它与“公共水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一个“国际水域”概念？还有，现在到底有没有“国际法”？还是只有“公约”“条约”“协约”？“约定”和“法律”是一回事吗？包括《宪章》和《宪法》也是一回事吗？现实是，因概念的不确定确实带来的很多思想混乱的问题不可小觑。

二、“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问题

但是，“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安全问题呢？其实，它也可以算在前面讲到的“信息安全问题”范畴之内。但它又不是信息的全面性和系统性问题，而是信息的深入性、内涵性和细致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概念”很多都是一些模糊概念和张冠李戴

概念。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概念”其实都是与词汇脱节的“理念性概念”。而跟名词之间的望文生义的关系既不是很多，也不密切。于是，对“概念”的理解就存在了一个张三这么解释、李四那么解释和王五那么解释的区别。这些解释都是根据自己的体验、感受和理解形成的，往往是五花八门的，而其中没有一个中间核心的东西。这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词汇和术语“符号”本来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中文、英文等文字的内涵本来是什么的问题。没有这个核心，任由解释，都是牵强附会的，都是容易造成逻辑和思维及其思想混乱的，就会出现“国家安全”的新势态和新问态。对于“概念”的文字表达到底用一个什么字好呢？其中的文字词汇和术语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就是跟文字的形状和结构及其形态密切有关。

其实，在现在的现实当中，这个“概念”的状况对我们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冲击是很大的。比如说，最近在研究“卫生健

康现代化”概念及其指标体系时就是一样的，就有这个特点。我们现在研究的到底是一个“卫生”问题，还是一个“健康”问题？还是一个“医疗”问题？还是一个包含它们在内的整体的所有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是把 health 翻译为“卫生”的，如“世界卫生组织”。但在很多场合，我们又把它翻成了“健康”的。但在英文当中，health 这个单词就可以包含“卫生”和“健康”这两层内涵的。但是，我们如果对中文的“卫生”和“健康”两个词汇和术语分别来看的话，其中在内涵上就既有重复的问题，但它们更有分属两个不同范畴及其系统的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医疗”概念。我在“浙大财税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黄颜色的秋天”里曾经发过一个主张“医疗现代化”的文章，就阐述了对这个“概念”问题引起的思考。我们现在是，光在提“卫生健康现代化”，但往往就缺少了一个“医疗现代化”。一定要有一个“医疗现代化”的概念。我们平时一般接触较多的是“医学院”和“医院”。可为

什么很少“卫生学院”或者“卫生大学”或者叫“健康大学”呢？其中的三个词汇和术语的内涵和含义肯定就在这里。但它们是不一样的。在“医学院”，就有“医”这个概念。当然，这个还是属于知识专业范畴的。这从某个方面看，还是有不少甚至很大的局限。其中就有一个对“医”的概念怎么理解的问题。比如说，有两个概念，我们平时都是基本不分的。比如说，什么叫“医生”？什么又叫“大夫”？经过研究后发现，它们的差别其实应该很大——“医生”是看疫的并且让得疫者进而获得重生的人；而“大夫”就是看病的。其中，“得疫”和“生病”的机理也是不同的。

三、“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最容易引发和发酵政治意识形态问题

但是，如果从更大的角度来看的话，“概念”问题还会引发很麻烦的问题，或使问题发酵得会很麻烦。比如，在十九大之后的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修宪”的时候，有一个“宪法修正案”是说，

对当时宪法的第79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修改完善。第79条第三款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原来在之后还有这样一句话，“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在这个“宪法修正案”中，把后面这句话——“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删去。其实，从中文角度看，此“宪法修正案”既说得很明白，听得也很明白。但是，一旦把“国家主席”翻译成英文后，就被不怀好意和善意的人钻了“概念”的空子。我们把“国家主席”翻译成英文翻成了什么呢？用了“总统”——president的概念。那么，在人家看来，这就是“国家总统”任期两届的限制取消了。如果是从体制上来讲，在“共和制”的体制当中，“总统两届”是一个法定概念，甚至是一个标志概念。那么，把它取消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是显而易见很糟糕的一个印象理念问题。所以，这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很多甚至很大的对我国政治体制认知的波动。这个波动至今还在蔓延式地影响着

很多人对我们的党和国家及主义的很多认识 and 理解的片面性和偏差性。但我们的体制既不是“共和制”，更不是“总统制”，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授权的国家主席制”。但是，对“国家主席”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成英文呢？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是把“主席”翻成Chairman的。虽然现在百度上也可以查到，“国家主席”也可以翻译为president的。但现实如果把“国家主席”真的翻成了“总统”president，其实就是陷入了“总统制”概念的思维定式之中，“国家主席”就会在“总统”的温度和浓度中发酵甚至发臭。

四、“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应该引起政治学的足够高度重视

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还有一个概念其实也是有问题和可以再斟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翻译“中国共产党”时，英文用的是CPC。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把“党”翻成party的。在英文当中，party本质上是一个“部分人”的概念。它

实际上是一个接近于“社团”的概念——就是由社会中的部分人（Party），而不是全体人组成的，或者它是一个“议会党”，或者是一个“选举党”的概念，就是在议会开会和选举的时候才有作用的概念。它不像在我们社会和国家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思想先进党”“常态执政党”“主义理想党”和“事业领导党”。虽然我们共产党在成立的时候，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就是从1921年一直到1949年的那段时间内，就是一个社团，至多也就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社团，以及是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社团。那时候，跟“民革”，跟“民盟”，跟“民进”，跟“农工”，跟“致公”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社团，它还有武装。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字依旧翻成英文party的话，就会出现体制上“抗原抗体”问题，就会出很多体制上的问题。它实际上是需要转型升级的。所以，目前就存在这个类似的问题。如果继续把它翻成

英文是 party 的话，到西方社会去就无法传达概念所包含的理念——它是一个“领导党”。最多也就像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性质和作用。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一般只有在议会和选举中才会发挥作用。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把选民按照对竞选人选择的不同而成为了“民主党人”，或者是“共和党人”。但在平时不选举的时候，或者在议会休会的时候，即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基本是没有这方面意识及其很多区别的。这方面完全不像我们共产党这样。所以，这就要求，要有或者要用一个新的英文概念，或者一个新的英文词汇去代替这个 party。国内已经有学者主张，要以“党”的汉语拼音 dang 来代替英文 party。

这其实可以从以前的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在有很多的概念都是能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面找到对应的情况下，对找不到对应词的中文文字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一样的，尤其是“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更难在“近代化”的话语体系中找

到。实际上，它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把中文及其汉语拼音直接转译过去一样的。比如说，“功夫”“太极”“夫妻肺片”“辣子鸡丁”，等等。当然，“辣子鸡丁”好像还是可以被直接翻成英文的。其实，随着“中国菜”的走向世界，很多菜名用的都是汉语拼音。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中国菜的菜名。然后就赋予了特别的含义，并且也渐渐地被人所接受和采纳采用。这个感受在英文往中文的转译过程中也有同感，如把 Coca Cola 翻成“可口可乐”。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生活的现象中理解政治的现象，甚至把生活现象变化为政治现象。

五、“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来自于“概念”的不准确、不体系和不系统

当然，政治现象虽然要更加复杂一些，但基础还是社会现象。其实，我们现在就应该在政治上要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个现象其实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就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先让国内社

会接受，后让国际社会认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基本特征就像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有时是波峰有时是浪谷。这是一个十分动态的过程。

其实，探索“新概念”也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甚至是一个现象。这其实也是哲学的一个功能。西方学术界其实一直都在出台不断创新的学术名词、术语和话语体系，都会根据时代的不同而有新的词汇和术语的出现，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光是我们就知道的“存在”概念。就有马克思的“存在”概念，就有弗洛伊德的“存在”概念，就有萨特的“存在”概念，还有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我们现在都是把这些概念翻成一个存在概念的。但是实际上，仅从英文上看，它们在词汇上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新问世的词汇都有它独特的内涵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按照现有概念去套的。而真正是自己深思熟虑的或者是创新出来的带有新时代特征的概念就很少。于是，我们现在就形成了一种叫做“以旧瓶装新酒”的现象。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它

的内涵实际上是新的。但它外在的词用的都是旧词。但实际上，旧词又是难以包容新意的。虽然有的时候是可以包容的。但很多时候是包容不了新的内涵的，甚至有的时候还容易搞混。比如说，我最近在研究“疫情”时发现，我们在说法上是，又是“疫情”，又是“病毒”的。这本身就有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其实，这个“病”跟“疫”，现在大家在概念上其实都没有把它们分开、分清楚。其实，这两个字所反映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的。“病”字因为里面有“丙”。“丙”从五行来看，就是“火”——就有“丙火”的说法。什么意思？就是说，人的不适是由“上火”引起的。而由“寒”——身体寒引起的不适，就叫“疫”。最典型的这方面研究的书叫《伤寒论》。那种不适就是由“寒”引起的。所以，现在，我们在抗击疫情当中用“病”这个概念就有问题。我们现在是，一会儿是“病毒”，一会儿是“疫情”。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说“病情”和“疫毒”呢？实际上是，“疫情”是具有传染性的，所以是“得疫”。而“病毒”一般是不具有传

染性的，所以是“生病”。但在“西医”话语体系中，“病”与“疫”是不分的。这也是“西医”落后的地方。这主要是一种思维的落后。同时，为什么不说“疫毒”而说“病毒”呢？所以，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我们现在是跟“西医”一样而都没有分清楚，但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

其实，在疫情中有一个问题也老在萦绕。什么问题？就是，为什么叫“医生”？为什么叫“医院”？它们跟“疫情”有什么关系？“疫”跟“医”发音相同。为什么现实中还有“大夫”的称呼？“大夫”与“医生”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现在都没有很好地把它们区分开来，而弄成了一回事。但是，我们把它翻成英文，不论是“医生”还是“大夫”都是 doctor。所以，英文的概念相比中文来说还是简单了一些的。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思维和词语上的概念。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说到过，“医生”是“看疫”的和“治疫”的。可他是怎么“治疫”的呢？从中文繁体字中可以看出一些道道——从繁体字“醫”中可以看出，“治疫有两种方法，

一是“针灸”——从“医”字中得知，二是“喝酒”——从“酉”字中得知。其中在中文的组合字中，凡“酉”字基本都是一个“酒”字，如“醉”。

六、“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现实很严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为什么说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的非传统安全是来自于“概念”呢？包括人员之间交流的时候，由于所用的概念都是不同的，所以相互之间也不容易理解，甚至还会误解。比如说，我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在研究台湾问题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和平”？对台湾问题特别敏感的人都会关注涉及两岸问题的术语和词汇发生的变化。现在，对两岸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与台湾人沟通，也需要与美国人沟通。我们在与台湾人对话和向台湾人喊话时都在说，两岸要“和平发展”。台湾人也在说，“两岸要和平”。甚至美国人也在说，“两岸要和平”。但是，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大家对“和平”的理解明显存在差异。“和平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它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基本上就是一个“非战争”的概念，就像与我们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不打仗”“非战争”的概念。最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台湾人用的“和平”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美国总统也在说，台海两岸要和平。他也是主张要“和平”的。但我们的“和平”与美国的“和平”跟台湾人的“和平”是不同的。台湾人和美国人的“和平”基本是吻合的。它们符合什么？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和平”概念。所以，在对话的时候，老是说“和平”，但它里面其实更多是一个“平等”的概念——“和平”里面更多的是一个后面的平等概念，就是双方都具有一样的权利。而且，从《联合国宪章》之后，一般只有在国际层面才采用“和平”这个词的。我们从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也是正式向国际社会推出和推崇“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在国内事务层面，如同在家庭里面一样，一般都是不用“和平”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讲，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或者国台办的发言人也都在说，

我们两岸要和平”。这实际上是，这样的话语体系已经是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国家在对待了。而一般在处理国内事务当中都是不说“和平”这个词汇的。或者说，要“和好”。所以，我们说“北平和平解放”时还有道理，但说“西藏和平解放”时就有很大的后遗症了。区别在于，“北平和平解放”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而到“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事件中的地位已经截然不同。所以，“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基本来自近代概念没有消化地进入。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概念”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很厉害，包括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很多问题也都是来自于“概念”的。就是说，“概念”的老化、“概念”的西化，等等。概念的模糊还会带来思维的混乱和思想的反动，而且还是符合逻辑的和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因为我们在应用概念的时候又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和想法在表达。可是，当你说到那个概念的名词时。它又在西方社会或者英语世界的理解体

系中。这跟我们有差距，有的甚至差距还非常之大，有时甚至还是南辕北辙的。因为它在语言习惯上是不一样的，是具有文化惯性的。

七、瓦解“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在于要做好中文第四次造字

在这方面，最近就在琢磨对策问题——到底应该把“概念”的这个情况怎么理解？要确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非传统安全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思考，怎么来消除这个问题。主张，我们应该要进行第四次中文造字运动。中华民族历史上已有三次造字。第一次是造出了甲骨文，第二次是造出了现在看的繁体字，就是当时的隶书和楷书。然后第三次造字就是造出了简化字。这个简化字比较简单，就是把复杂的繁体字简化了。但从现在运用的情况看，由于使用繁体字的人看不懂简体字的现象看，简体字实际上应该算第三次造字。现在看，我们跟台湾岛上人在交流当中就面临这个问题。语言虽然相同，但文字已经不同，

而且还在越来越不同。这是中国几千年不见的情况。中国起码两千年来是虽然语言不通，但文字是相同的。现在，台湾岛上人用的都是繁体字。他们看我们大陆上的人用简体字写的文章，好多还看不懂。这就存在一个“分裂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那么，现在面临第四次造字。

其中，第四次造字里头要有一部分是对第三次造字的纠正。在第三次造字当中，就有用繁体字变成简体字变错了的字。最典型的一个字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听话”的“听”那个字。那是一个“口”字再加一个“斤”字，也即“斤计较”的那个“一斤”“两斤”的“斤”字。再来看，叫“ting”的繁体字——“聽”，就是一个耳朵旁。所以，第三次文字改革，怎么能连偏旁都给弄错了？偏旁是做什么用的？它基本是给字定性的。所以，人家就看不懂了，这是一个什么字？这个就存在问题，所以，就要纠正。就要很多。因为它就像现在很多甲骨文一样的，通过造字的规律，把某个甲骨文字读出来，读懂。

现在，新中国成立刚刚七十来年，这个简化字就有问题了。

同时，就是还要造一点新字。但新字又要怎么造呢？

比如说，里头有一个概念，本文在前面也已经讲了——我们共产党的这个“党”字的概念究竟是什么？中文的“党”的繁体字——“黨”，它本来就是一个“尚黑”概念。这主要是，在其繁体字下面确实是有一个“黑”字。关于这个字，很多人都是有体会的——很多人在去党校学习快到学校门口时，往往会在路边发现“省委黑校”的牌子。究其原因主要是霓虹灯坏了。繁体字“黨”字上面那个头的霓虹灯坏了，就变成了一个“黑”字。看到这个现象的人这才注意到，原来繁体字的“黨”的下面真的是有了一个“黑”字。

可是，再看现在的简化字又发现，我们这个简体字“党”字下面是一个“兄弟”的“兄”字。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尚兄”的概念。但是，从现在“党”的字体上看，还是看不到党的先进性。其实，在古代社会，这个“黨”的繁体字就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一个“结党营私”的党，是“朋

党的党。因为它里头有一个“黑”字，所以，这个“黨”字在说“中国共产党”时是不能用的，是隐藏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但我们现在很多都喜欢写繁体字，但这个带“黑”字的“黨”实际上跟我们现在党的性质不一致，而且还截然相反。而我们以前在中学的时候，不是好多在学历史的时候会经常说到“结党营私”不好。当时，我们就说，这个“结党”有什么不好？不是“党”是好的吗？但是，放在古代去看“黨”，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好的。所以，本文就主张，应该造一个字，就是具有先进性的“党”的新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字呢？就是要把下面那个“黑”和“兄弟”的“兄”换成“先进”的“先”字的那个“尚先”的党字。

那么，这个字怎么能造呢？其实，唐朝的武则天都敢造一个“明空”的“曩”字。其实，在20世纪初叶的时候，我们还造过一个“她”字。赵元任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对创造“她”这个新字很好的纪念。现在都进入新时代了，很多思想都是新的，就应该去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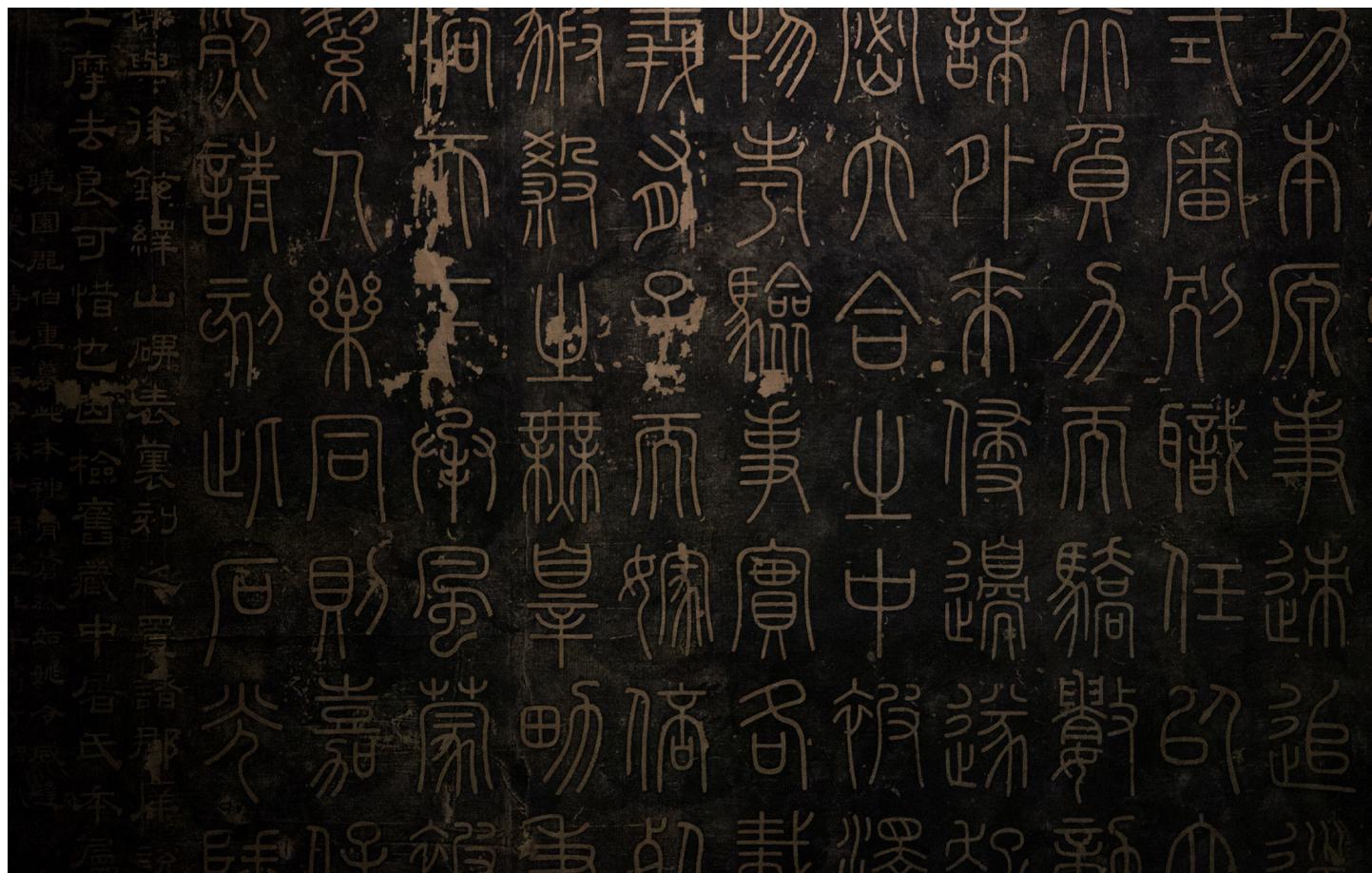
一个新的“裳”字，而且还要把它慢慢地用到一个常态的程度。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了与概念匹配的文字。文字一定要随概念的变化而引起字体字形的变化。其中，内涵是身体，字形字体是衣服。在现代社会中，现代人追求的不仅是衣服要得体，还要美观，更要有新鲜感。

这是我最近在反复琢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早已

在大脑里翻滚，只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审视它的角度和方式。目前，它还不是琢磨的结束，而只是开始，只是刚刚在提出问题，还有许多深入的、细致的和细节的工作要做。特别是还要做好对“概念”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宣传工作，要让很多人具有非传统安全的意识。虽然在与很多人交流时，大家都没有感到，这个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不少人甚至还认为，这

是在无病呻吟，或者只是在玩弄名词，在浪费时间。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意义深远。其中原因是，对“概念”的发酵力度缺乏认识，对“概念”的发酵规律还缺少概括。正是“概念”发酵至今的无规律性才最终导致了“概念”成为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

编辑：王星懿



编辑团队



王星懿
执行主编



梁海瑶
研究助理



许汶
研究助理



尹金灿
研究助理



杨佳琦
校对编辑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本刊由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合出版，旨在跟踪观察非传统安全议题下的社会资讯、政策动向和学界研究，为从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提供时新、长久的信息渠道。

本出版物内容版权属于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转载、摘编请注明“来自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如因作品内容和版权问题需要同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系者，请于 30 日内进行。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亚洲国际
大酒店 1803 室

联系电话：
020-83870795